

在万事万物的有限与时间的无限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张力:时间的无差别“风化”作用让“意义”的意义成为一个难题。为了对抗这种矛盾或者缓解其所带来的存在式焦虑,人们发明了传记,只为在时间的巨流中留下一座浮标。在著名作家赵德发的新作《黄海传》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努力:给空间性的黄海一个时间性的定位,让时间的不可捉摸与空间的可观可感在文字中交汇成一张黄海的“使用说明书”。从此,黄海不再苍茫孤寂,而是“升华”成人类象征体系中一个符号性的独立文明主体。

《黄海传》这部特殊的传记文学作品,在继承三大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三种鲜明性质,建构了完整立体饱满的“黄海魂”。

《黄海传》通史地传统,呈现出扎实的科学性。传记的突出特征是现实性或真实性,尤其需要科学的创作态度,这也符合我国史传、舆地写作的悠久传统。此书在科学性上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一是写作专业性,这在不同章节有不同体现,如第一章“亘古沧溟”中大量地理学术语以及地理演化的阐述,第二章“蓝海帆影”、第三章“风云激荡”中对历史史料的大量引用与细致考据,第四章“巨变种种”里的众多经济数据。二是视角的全面性,关注到了其自然属性、人文属性和经济属性,这让《黄海传》既是黄海自然传,亦是黄海人文传、经济传。三是内容的可靠性,作者不仅采购了大量专业著作,更在数年间“从长江口走到了鸭绿江口”,沿黄海西岸考察了一圈。作者把这场创作比作一场“古法煮盐”,在我看来,所谓“古”是相对于现在的“笨”,而这种“笨”其实是治学之“实”;所谓“煮”则是指此番创作之“繁”,而正是这种“繁”,才更见作者创作之“诚”。

《黄海传》通文学传统,呈现出浓郁的审美性。赵德发创作过很多小说,而作家之创作是要以审美为追求以区别于其他文字产品的,这也是传记和传记文学的重要区别:传记不必求审美,而传记文学不可无审美。文学的审美性在《黄海传》中体现在结构、语言与资源化用之上。就结构而言,目录即是一大亮点:书分四章“亘古沧溟”“蓝海帆影”“风云激荡”“巨变种种”以及题为“望洋兴叹”的“尾声”,对仗押韵;而每章各小节的小标题又字数相等,呈现出精致的结构美。传记之语言很容易显得干枯,但《黄海传》之语言可谓典雅,遣词造句精炼流畅,略显古风而不失于生涩,颇有以“诗笔”作“史笔”之意。失败的传记往往会沦为资料汇编甚至堆砌,然而《黄海传》避开了陷阱,寓旁征博引于从容叙述之中,信手拈来的史料被自然而然地娓娓道出,不突兀、不生硬、不啰唆,浑然天成、俨然一体。总之,精巧的结构设计、老练的语言运用、娴熟的文字技巧,为《黄海传》增添了闪耀的美学光辉。

《黄海传》通哲学传统,呈现出强烈的思辨性。传记写作之难在于把握传主和作者的关系,如若传主完全吞噬作者,作者便成为传主的“传声筒”;如若作者压过传主,则违背了传记的写作伦理。在《黄海传》中,赵德发的处理方式是在尊重传主前提下,设计了多维度的深度对话,从而让纪实性传记呈现出哲学意味。

一是人海对话,中华民族讲究安土重迁、耕读传家,然而也有“蓝色”的一面,黄海沿岸的华夏儿女很早就与海洋展开互动,《黄海传》生动记录描述了先民从黄海获取资源、在黄海锤炼性格、向黄海追问存在的漫长“对话”。二是古今对话,《黄海传》时间跨度宏大,写出了黄海从亘古到当下的沧桑岁月,客观上形成不同时间段之间的纵向对话,揭示出黄海及沿岸演变的自然规律、历史教训、未来之路。三是中外对话,相对于太平洋黄海是“边缘海”,相对于东亚黄海却是“中心海”:位于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甚至可称为东亚“内海”。在这片“内海”之上,东亚三国展开了几千年的文明对话,比如中国的“鉴真东渡”,朝鲜半岛的“箕子移民”,日本的“遣唐故事”,以及一系列战争。《黄海传》中,“它”(黄海)是主角,而“我”(作者)也多次出场,形成“主体间”的哲学对话。黄海见证了东亚汉字文化圈形成与发展,一部黄海史就是一部东亚文明交流史,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哲思、民族哲思、文明哲思。

赵德发在“后记”中写道:“我想,黄海恒久,万古澎湃,而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在短短的生命中,能与黄海结缘,为黄海做传,是我人生一大荣幸。”所谓“万古澎湃”中的“匆匆过客”,就是“生也有涯而时也无涯”之焦虑,这种焦虑无法终极解决,但至少在此书的创作中得到了象征性的超越。赵德发所言的“荣幸”,是因为他其实并没有“匆匆走过”,而是把黄海纳入了史地、文学、哲学这三大文明传统之中,真正描绘出了黄海的灵魂面貌。所以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海洋大学温奉桥教授才会说:“不知黄海有无海神,如有,会发出欣慰的笑声。”

作者简介:张波涛,中国海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
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扫码关注
『文化青島』

挥如椽巨笔,为黄海塑魂

——评赵德发传记文学力作《黄海传》

◇张波涛

命运的叩问与选择的迷途

——观电影《死亡护理师》有感

◇王国梁



有关临终关怀的影片并不在少数,比如《温暖的告别》《失控的生命》《心灵病房》,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入殓师》。与之主题不同却更加令人感慨的另一部电影是《死亡护理师》。这部颇具争议的影片,通过完全相悖的视角,揭露出临终关怀的终极探索,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什么样的选择才是真爱?

主人公斯波在一家护理公司工作。他和同事们主要的工作是照料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在儿女因生活压力所迫无法照顾老人的情况下,护理公司的出现给了他们生活上的缓冲。在那里,工作人员会为老人检查身体、整理家务、洗漱料理,甚至为死去的老人守灵。斯波的护理水准堪称楷模,对待老人,他总是笑脸相迎,任劳任怨,被新入职的同事奉为典范。一切看似平常,一切又都暗流涌动。一位老人意外离世,勾起一桩惊人的谋杀案,四十多位老人死在斯波的手上。面对检察官讯问时,他却平静地说:“我拯救了他们。”因为在斯波看来,这些老人长期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家人的嫌弃,对他们而言,自己不再是一个人,一个有尊严的人,甚至无数次想离开这个世界。

斯波的怪异思想和行为与他的经历有关。他从小被父亲带大,父亲衰老后,他决定尽一切可能为父亲尽孝。但随着父亲病情加重,斯波再也无力照顾他,甚至无法去上班,申请低保也不被允许。偶尔有一次父亲处于清醒状态,他对斯波说:“你帮我个忙,杀了我吧。我不想这么活下去了。”斯波犹豫再三,最终还是通过注射尼古丁结束了父亲的生命。侥幸逃过警察检查的他认为自己被赋予了使命,于是以同样方式结束了41位他照料过的老人的生命。

女检察官大友了解到,斯波通过监控发现这些被照料者的痛苦,他们不仅要忍受病痛折磨,还带给家人无尽的伤痛。他们的“活着”,已经背离正常人的轨道,成为负担。在斯波看来,如果不结束,就无法重新开始。就像影片中的羽村一家。羽村既要照料年幼的孩子,还要去打工,还得照顾近乎癫狂的母亲,这种生活让她濒临崩溃。母亲的离世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虽然是以谋杀达到目的。

影片没有设置悬念,在大友检察官逼问下,斯波很快承认了杀人。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并没有错,他不仅拯救了即将死去的老人,也拯救了活着的人,让他们不再受亲情羁绊,重新好好地活着。但在大友看来,再多堂而皇之的借口都是在为谋杀找托词,人的生命岂能随随便便就被别人剥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虽然赞成安乐死,但也不赞同假借他人之手。安乐死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从法律角度,前者更倾向于无罪,而后者则往往被判定为谋杀。影片中,斯波的行为就是一种积极的安乐死行为。

大友的母亲患老年痴呆,无法照顾自己。被斯波称为在“安全地带”的大友把母亲送到了条件完善的养老院。但女儿最终也明白,其实母亲并不愿意待在养老院,只是想为女儿减轻负担。斯波为父亲注射完尼古丁后,从父亲的枕头下找到一枚千纸鹤,上面写着:“感谢你做我的儿子。”可见,父亲并不想离开斯波,但又不想因为越来越糟糕的身体拖垮儿子,他想让儿子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

我们在谈生命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想到的只是自我,是一个点。我们并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的“活”有着前因后果,不仅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更给了自己的孩子以生命。在生命与生命交错延续的过程中,爱便诞生了,成为我们维持生命的强大营养。但爱同时也是脆弱的,在残酷的生活中,爱会变得沉重、破碎乃至模糊。但爱从不会消失,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暂时改变了面貌。

我们讨论人“生而为人”,其实说的是“社会人”的概念。即这个人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可以拥有人所应具有的一切权利包括生存的尊严。一旦脱离了其中的任何一个属性,那这个所谓的“人”,起码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可以被定义的人。

《死亡护理师》所讨论的,恰恰是“人”与“非人”的模糊地带,也是对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的终极拷问。“与其如何,还不如怎样”是积极者的逻辑,而“即便是如何,又能怎样”是消极者的依据。就像人不能选择“生”一样,对于死亡的选择也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人既然身处社会,必然要受到法律、道德等约束。很多事情的对错,无法通过简单的表象去判断甚至做决定。之所以人类社会还在继续向前,是因为总有一些事情值得期盼。就像电影《入殓师》中说的:“我送走一个又一个人独自离开,逝去并非终结,而是超越,走向下一程,路上小心,总会再见的。”

作者简介:王国梁,《青岛文学》杂志社编辑。